

# 學者名人主講 市民反應熱烈 抗戰論壇研本港淪陷史

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大型展覽

【大公報訊】為了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主義勝利70周年，《大公報》除了舉行大型抗戰勝利圖片展覽，昨日下午更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大型論壇，特別邀請本地學者及知名人士和市民講述「日佔」時期的香港情況，及分析二次大戰如何影響國際局勢的發展，逾二百市民扶老攜幼出席論壇活動，共同認清歷史。全國政協常委伍淑清、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袁武、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吳秋北、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黃秀蘭、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邱小金以及大公報副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徐荷等嘉賓出席了論壇活動。

大公報記者 唐曉明  
實習記者 羅嘉雯 盧穎珊  
關慧嫻 (文)  
蔡文豪 黃洋港(圖)



▲《大公報》舉辦大型論壇，特別邀請學者及知名人士講述「日佔」時期的香港情況及分析二次大戰如何影響國際局勢的發展

## 鄭寶鴻：日軍兇殘 死人無數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羅嘉雯報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的日治時代是香港歷史的黑暗一頁，港人始終忘不了日本軍隊對於香港的破壞和對港人的壓迫與剝削。昨日，博物館專家顧問鄭寶鴻（圖）於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香港論壇上，以《香江冷月：香港的日治時代》為題，通過實物展示，直觀形象地講述了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期間香港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進行經濟上的破壞和掠奪之外，本地建築、交通幹線亦被嚴重摧毀，鄭舉例皇后像廣場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被拆掉，原址則豎立了一個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更建忠靈塔紀念陣亡日軍。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使成為軍用物資，由於當時的運輸服務非常有限，甚至能看到馬車作為公共運輸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 見日軍不鞠躬遭毒打

另外，日軍當時的恐怖統治令本港人心惶惶。鄭介紹，日軍曾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引入鴉片；1943年於薄扶林道近堅尼地城放犬咬斃10名無辜華婦。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90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鳴槍遭受毒打腳踢甚至殺身之禍。市民需隨身攜帶「居民證」，另外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相家中的人不在，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冠上「窩藏游擊隊成員」的罪名。

鄭寶鴻先生表示，結合實物、照片和時事記錄，講述日治時期日軍的兇殘與港人所受之困苦，希望讓市民加深對香港日治時代的認識，銘記歷史。

### 港爆饑荒出現人食人

首先提到的便是日治時期的軍票和「配給制度」，鄭寶鴻稱，老一輩對這個時期的回憶多數只有「日日捱餓」。日軍的糧食，大多供給自己人及軍隊，糧食有限，他們向市民開刀。香港剛淪陷時，兩毫軍票可以換得一斤大米，到了1943年已升至100元軍票一斤，1945年更是300元軍票才換得一斤大米，而當時四元港幣換一元軍票，每人每日獲配的大米也從「六兩四錢」降至「三兩二錢」，即是一日大概只能吃半碗飯多少許。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有錢沒錢，都吃不上一頓飽飯，只能吃些「荷蘭豆」充飢，「飽死荷蘭豆」一詞由此而來。據鄭寶鴻介紹，當時因買不到米而餓死的人不計其數，有人甚至將屍體拖入家中煮食。

由於糧食短缺，日本不想養大量香港人，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用家屋所

有權登錄等藉口軟硬兼施強迫大量市民歸鄉，市民被迫驅逐至中國內地。1942年開始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運離港，但這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負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回鄉。同年十二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於途上分散，或被拋棄拋棄老少，或途中餓死、病死，至於途中被洗劫一空者亦難計其數。而於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1945年時，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人跌至60萬人。

侵略者的罪行遠不於此，鄭寶鴻現場展示當年的一本存摺說，當時所有銀號被迫關閉，整個淪陷期間存摺最多只可提500元，本地所有的外幣和黃金被沒收。除了對香港

## 馬木池：日需糧食漁業「幸存」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盧穎珊報導：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作為當時主要產業的「漁業」是少數能夠「幸存」下來的，連帶「漁區」也能繼續慶祝春節、「打醮



」等傳統節慶活動，原因何在？中文大學比較與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總監馬木池（圖）解疑，「控制漁業對恢復及控制糧食生產有重要戰略意義」。馬木池呼籲公眾多翻閱書本，了解抗戰歷史，「戰爭可怕，任何形式的強權政治都應反對」！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香港論壇」昨日在會展中心舉行。馬木池在演講中用1943年筲箕灣漁民歡度春節、長洲漁民打醮的事例為引子，分析日佔時期香港社區節慶活動能保持的原因。他認為，原因不是「以華制華」，而是日本政府施行的一元統制政策，建立漁業統營市場，控制香港漁業。

他解釋，香港的地理環境使農業發展受限，而漁業則得天獨厚，因此，控制漁業對恢復及控制糧食生產有重要戰略意義。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日本政府將香港劃分成長洲島

、筲箕灣等八大漁業社區，每個漁業社區建立一個名為「戒克漁業組合」的管理機構。通過將人口登記、漁業必需品的配給與該機構掛鉤，形成控制。此外，每個漁業社區皆會建立漁業統營市場，所有魚類都需在某市場買賣，生產商、中介商可以從中抽佣獲利。而長洲島、筲箕灣分別為當時最大的鹹魚場和鮮魚場。

馬木池稱，在這種政策下，漁民的溫飽得以保障，社區才得以進行節慶活動。然而，漁民從市場獲利比實際少。因此仍有漁民無視「不經指定批發市場，擅行販賣者，處於軍罰處置」的規定，鋌而走險。「有漁民曾試過將自己的漁獲從筲箕灣運到西環販賣，不過私下販賣漁獲概依然係少數。」

儘管社區節慶能繼續留存，但馬木池呼籲公眾多翻閱書本，了解抗戰歷史，認為戰爭可怕，任何形式的強權政治都應反對。

## 陳勇：牢記歷史才有和平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報導：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香港論壇昨日舉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圖）以「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為題，提醒市民勿忘歷史教訓。陳勇指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人民團結一致，牢記這段苦難歷史，時刻準備自強發展，才能避免軍國主義復辟，令任何侵略戰爭不再出現。

陳勇提到香港淪陷期間抗日義士的犧牲時，一度眼泛淚光。陳勇表示，雖然香港不是中國抗日戰場的主線，但是當時不少十餘歲的少年人已經站出來參加抗日游擊隊，為保衛國家、保衛香港出力。他又指出，游擊隊犧牲比例，與其他正規軍是不相伯仲，因為他們化妝成普通市民刺探情報，例如刺探日軍武器數量、敵方人手調配情況、日軍的戰機數目等，同時亦要營救加拿大、英、美等國的戰俘，以及包括著名作家茅盾等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英，將他們護送去根據地、解放區，中間的過程甚至比不少正規軍更加危險。

陳勇說，希望這個世界不同的國家民族都能夠共同發展，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人必須謹記日軍侵略中華的慘痛歷史。他又指出，中國犧牲三千七百萬人命，財產不計其數，而且現在日本軍國主義還欠我們香港超過五億港元價值的軍票未經處理，我們不能忘記日本軍國主義所欠的人命、財產和苦難，只有牢記這段苦難歷史，時刻準備自強、發展，才能令軍國主義不再復辟，令任何侵略戰爭不再出現，令地球永遠和平，否則只會如西方哲學家所言，「如果你忘記了戰爭的教訓，慘痛的經歷好快就會再次出現」。

陳勇又向會上聽眾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有游擊隊老兵向他表示，當時的海上總隊只有幾隻破漁船，抗戰勝利後，這支軍隊保留下來，經過不斷發展，後來更成了中國解放軍的海軍，該隊編制的海軍更於1997年7月1日，以駐港解放軍身份留在香港，所以現在駐守在昂船洲的海軍，就是當年海上游擊隊的傳承。陳勇又感謝《大公報》補充了不少抗日時期的空白歷史。他指以往無權威機構去做，現在《大公報》為抗日歷史做了一個好權威的認證，希望將來更多人努力還原歷史。

## 沈旭暉：美扶持日右翼勢力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關慧嫻報導：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沈旭暉（圖）教授昨日以《二次大戰時期的亞太衝突與當代國際政治》為題，在「全港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型展覽」中發表演講。沈教授從二戰史論述現時日本的右傾政權的成因，以及這個政權所引致的外交局面，以至如何影響現時甚至未來的中美日關係與定位。

沈教授先從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說起，指出現時的安倍晉三政府使到有不少人憂慮，「軍國主義」繼二戰後再次在日本興起。這個現象的成因，是由於二次大戰後遺留下來的右翼政府的傳承，現時的安倍晉三政府正是極右派的政黨為主導。

在二戰結束後，由於美國要利用日本在亞洲地區維持勢力，當時本應受審的日本右派政治人物沒有受到審判，還使日本的經濟很快速

地由戰敗的局面扶正。這過程使到日本政府非常依賴美國，同時亦對左翼極其戒備，特別是日本共產黨。

冷戰後，日本政壇元老小澤一郎通過「毀黨造黨」來打擊左翼政黨，使到日本政壇變成現在這樣嚴重右傾的局面，當中又發展出像是安倍晉三這樣的極右派，想要執行「普通國家法」，擺脫「和平憲法」的控制，擁有正規軍隊。

沈教授接着提到日本右派和中國二戰後的衝突，在賠償問題上，日本和中國在「ODA」——政府發展援助的理解存有很大不同。日本認為自己對中國所發放的「ODA」已經等同賠償，所以無視中國民間對日本軍票和慰安婦等問題的索償。

他指，現時中日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中日綜合國力的落差。由於中國國力愈來愈強，而

日本則愈來愈差，加上人口老化等問題，社會民生已大不如二戰剛結束時，這使日本有很大的落差感，政客亦因此利用具民族主義的言論來爭取支持。

中國現時在外交政策上，積極對外宣傳抗日戰爭是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習近平主席亦推動「道義現實主義」，即中國發展雖要講求利益，但前提要負上一定的道義責任。這和安倍晉三的「積極和平主義」有着明顯衝突，因為兩者皆擔當積極的角色。

除了外交政策上的衝突，東南亞國家的取態亦是關鍵。尤其是在戰後，東南亞國家在經濟上得到日本很大的幫助，但中國崛起後卻使他們的立場搖擺不定。

由中日矛盾到中美矛盾，沈教授提到中國現時的「一帶一路」和美國的「Pivot」政策是



完全對立的，而日本必須作出選擇，不論是偏向哪一方都會有所損失。如果選擇和中國經濟整合，便意味着日本可能要接受以中國為領袖的同盟關係，而假如是加入美國的「Pivot」，日本的農產品業又會受到影響。沈旭暉認為，現時日本的選擇，將會成為當代國際政治歷史上重要的一環。